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华之魂

——梦萦录

中 华 之 魂

——梦萦录

(中)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97 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审定
中小学图书馆必备书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萦录/中华之魂丛书编委会编. —2版.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7. 7
(中华之魂丛书)
ISBN 7-80078-230-1

I. 梦… II. 中…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460 号

中华之魂——梦萦录(中)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交民巷 23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625 印张 383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2 版 1998 年 8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18001—33000 册

ISBN 7-80078-230-1/K·10

定价:86.50 元/套(5.76 元/册)

目 录

继承遗志，振兴中华	任 湘 (154)
宽阔的胸怀	蔡 诚 (168)
任远志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翟明战 (172)
水电将军贺毅	庄家新 (180)
我也有个金色花季	曾宪波 (252)
从小没有家的李敏	文 明 (259)
从摇篮里走出来的专家	庄家新 (272)

继承遗志 振兴中华

任 湘

不知道妈妈是个什么样

父亲任作民 1920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在上海“党办的俄文补习学校”补习俄文，1921 年初由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去学习的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父亲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罗亦农是入党介绍人。同年被派往苏联远东赤塔领导工人运动，并主编“工人之路”报，担任该报党支部书记。1925 年奉召回国，担任党中央机关秘书兼会计。同年妈妈范友莲也从乡下来到爸爸身边参加革命。听老人们讲妈妈是个穷家女儿，结婚过门时还是爸爸家给做了一身新衣服，但她的性格非常活泼，聪敏贤慧。妈妈和爸爸婚后不久妈妈还怀着哥哥时，爸爸就参加革命了。这次妈妈来到爸爸身边，年轻夫妇久别重逢，异常兴奋。到上海后，妈妈和爸爸一起在机关工作。妈妈边学习革命道理，边做通讯工作。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党中央机关要迁往武汉，派爸爸前去筹建。此时的妈妈因多年的劳苦和虚弱而患染肺病并又有身孕在身，由于白色恐怖，妈妈不幸被捕入狱。身怀六甲又是病体，还要承受牢狱非人般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不久即病危。经组织多方面的营救，母亲才得以出狱。母亲出狱后，党组织多方照顾，为减少麻烦，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房。不到一个月，一个弱小的生灵——我即哇哇落地。几经磨难的妈妈见革命又多了一颗种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妈妈生下我不到两个月，终因积劳成疾，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折磨便与世长辞了。党中央派毛泽民同志将母

亲的遗体和我一并送回老家湖南省湘阴县上双冲，母亲被安葬在家乡一个向阳的小山坡上。我因为还在乳期，老家除了已近乎于穷困潦倒的叔婶及几个孩子外，已无有其他亲属，他们无论从经济等各方面已实在无力喂养还在乳期的婴儿。虽然离此不太远还有一个年迈的外婆和多病的舅舅，但他们也已朝不保夕。……好在天下穷人心连心，我被一位好心的农村妇女喂养（因她的女儿和我一样大），她用自己的乳汁和心血，哺养着两个幼小的生灵。使我得以从死亡线上又挣扎过来。

刚被叔婶接回家，也因我的身体太虚弱了，不到半年差一点一命呜呼，已被当做死孩子送了出去。慈祥的外婆刚遭到心爱的女儿去世、女婿生死不明的打击，又得知这唯一的骨肉的消息，她哭喊着往山上跑，把甲盐包（草席袋子）包着的孩子又拾回来，打开席包将孩子捂在自己的胸口上，说也奇怪，已昏死的娃娃又哭出声来，似乎在向人间宣告：我要顽强地活下去！我被外婆带回家，但命运总好像和穷人过不去似的，两个多病的舅舅又相继病逝。从此我便和外婆相依为命地在人生道路上挣扎着。勤劳、善良的外婆经常讲故事给我听。从外婆那儿我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她用自己的全部心血，靠纳鞋底，干零活贫困度日，哺养着我，连捉到一只田鼠，也要煮熟给外孙吃。在老人病危时，无知的小外孙，还抱着外婆睡得很香，老人临终前连一句话也没能留下。……

1926年蒋介石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嘱，举起杀人刀疯狂镇压革命，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爸爸任作民也先后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1928年4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时；第二次是在1932年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前后7年的狱中生活，爸爸经受了各种刑罚、威胁、引诱、百般折磨，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德。双十二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经党中央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董必武同志直接从“武昌反省院”监狱将爸爸接了出来。出狱后爸爸任湖南省特委书记。

此时，我这个连妈妈都不知什么样在乡下打赤脚长大的孩子，听到了爸爸还活着的消息并很快就要回来看看从生下连面都没有见过的孩子。这一下我这个饱尝人间苦难，这个“红匪”的儿子终于露出了笑容。

第一次穿上八路军军装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爸爸刚出狱不久，就将哥哥（任楚）和两个表姐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往革命圣地——延安。我因为年龄太小不能同行，只好哭着同他们告别。

1939年，我高小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突然看到叔叔从长沙回来。他把我叫到身边说：生沪（我因生在上海，取名任生沪），你爸爸在长沙要接你去。还有姐姐（叔叔的大女儿任岳）和你一起去，记住一定要好好听话，不该问的事别问，不该讲的话不讲，搞不好你爸爸的命都要送掉的，记住吗？”叔叔一眼地说着。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心里又激动又高兴。激动的是自己好像懂得了革命的神圣，高兴的是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那一天我连觉都睡不着，一直盼等到第二天上路。穷人家的孩子出门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只是穿上了一身干净点的青布衫和婶婶做的布鞋，跟着叔叔和姐姐一起到了长沙。我终于看到了爸爸那几经磨难体弱多病，但非常可亲的脸。那张脸我现在仍记忆犹新。当时我们暂住在舅舅（婶妈的弟弟）家。乡下的孩子第一次进城感到什么都新鲜。那楼房，那商店，那人挤人的叫卖声，吵闹声……异常嘈杂。没过几天，爸爸和继母（丁视华，1923年入党，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又是地下党的文书。她慈祥可亲，讲的满口山东话）带着我们（任岳、沈宗沪、小妹妹庆庆）乘火车，从长沙来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夏娘娘热情接待了我们，并马上给我们量体做军装。在这里我们天天听讲革命道理，学唱革命歌曲。我印象最深的是唱苏联歌“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通过学革命理论和唱革命歌曲，我知道了社会主义是天堂，我们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干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反动派，建立社会

主义新中国。在这里，大家都称“同志”。当我听到别人称我“同志”的时候，感到非常亲切，并且感觉到这称呼似乎很神圣伟大。这称呼使我从根本上改变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

不久，上级给我们送来一套做得很细致的灰军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八路军军装，也是第一次穿上这么好的衣服，再加上军帽、胸章、臂章的衬托显得格外威武。爸爸也睁大了眼睛端详了我半天。但接着他又郑重地对我说：“从今天起，你穿上了军装，那不是一身普通的衣服，而是证明你是一个革命战士了。一个革命战士，要肩负起打倒反动派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他还告诉我一定要把胸章的号码记住，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下士（勤务兵）。并叮嘱我要记住，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支人民的军队，是由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后来我穿着这套军装和爸爸一起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时已是初冬了。

为革命而学习

一辆旧军用卡车载着满满一车人晚上才赶到延安，异常疲惫，尘土覆盖着冻得发青的脸的这群人，突然听到延安到了的呼声，个个精神振奋，挥臂欢呼，这呼声划破了被敌机轰炸得连一垛好墙都不存在的延安城的夜空。

刚一停车，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富春和蔡妈妈（蔡畅），就迎上来和爸爸长时间握手。……我们被安置在第二排窑洞休息，这窑洞是我们自己同志挖的，比老百姓的大一些，里面亮一些，并且在里面挖了书架，窑洞口进行了支护，窑洞之间挖通以防敌机轰炸，万一炸塌了一眼，人还可以从另一眼钻出来。这些窑洞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冬暖夏凉，最冷时，烧上几块木炭也就过去了。

头天晚上到达延安，毛主席准备第二天就召见爸爸。我这个小毛孩子当时还不知道毛主席是谁，爸爸告诉是革命的领袖，是

我们的领头人。早上，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穿一身打补丁的灰军装，虽然穿着与我们一样，但说话风趣幽默，加之动作的和谐有力，构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那的确是伟人，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普通的人。……毛主席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与毛主席分手时，他分给我们每个孩子两块钱让我们买些学习用具，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建设我们的新中国。果然我后来用毛主席给我们的钱买了笔纸等开始了以后的学习，并在以后的新中国建设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延安，我们又见到了帅妈妈（帅孟奇，她同爸爸一起搞过地下工作），她一见到爸爸就没完没了地说呀说呀，……谈话时，帅妈妈讲：别的孩子都叫我帅妈妈，你应叫我大姑。自那以后，大姑就拿我当亲儿子一样看待，关心照顾无微不至。以致到后来我当总工程师时，病重要动手术，还是她老人家以家长身份签的字，并常来医院看我。

没过多久，我们就被分到各个学习岗位，沪子年小被送到保育小学，而姐姐（何理良）和我则到了坐落在延安柳树店的陕甘宁边区师范。她们进二队，我到了三队。一开始，寒冷干燥的高原气候难以适应，但小孩子不久也就习惯了。同队的同学大多数是当地人（陕北军干层的孩子），从外地来的只有林炳南（林伯渠的侄子）、杨志（杨鲍安之子）、黄鲁（曾任能源部长的黄毅城的原名）等几个人。陕北的同志把我们叫“洋包子”，他们自称是“土包子”。那时的学习条件、吃住条件都非常艰苦，一个窑洞要挤十几个人，晚上睡觉翻身都得喊“一二”。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全部财产就是几件衣服包成的小包，这个小包在夜晚时还要当枕头用。为了学习，上级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块木板（约25厘米×35厘米×3厘米），写字时可以放在膝盖上当垫板，开会时可以当坐垫，真是一物多用。当时人也是一专多能的，我们虽然年龄小，但学习知识、搞室内卫生、进行军事训练等样样工作都抓得很紧。我们这个学校非同一般学堂，这是党中央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下，

为今后的新中国建设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而设立的军事化学校。我们学校有很严肃的军事教育，每天天蒙蒙亮，起床号一响，几分钟之内我们就要跑到操场集合上军事操，凡迟到的被点名批评，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注意。我们在学校吃的小米饭，值日生将大木桶抬来放在广场中，哨声一响就迅速开吃，大约十几分钟，结束哨就响了，我们必须马上停止。一开始我们这些“洋包子”对于吃小米饭和这种异常紧张的军事生活不习惯，以致于常常饿肚皮，直到今天我们几个老战友见面时谈起当时的情况还笑个不停。那时的生活很艰苦，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就连我们吃的小米、菜、煤炭等都要大家到远处去背。不过生活条件越苦，大家就越珍惜学习机会，所以我们都很有努力。这里生活紧张，学习紧张，军事训练也紧张，并且晚上还要站岗，放流动哨。因为人少环境又比较荒凉，所以经常有狼出入，我们站岗放哨即使有支小马枪，也很害怕。不过艰苦的环境最能锻炼人，时间一长，我们个个都成为名符其实的八路军的小战士了。

生活虽然又紧张又艰苦，但我们有我们的乐趣。我们那时一周学一支歌，一周开一次联欢会，开一次讲演会，一次生活会，大家无论在学习或军事训练上都很严肃认真，像个小大人，但在唱歌和联欢会上却都掩盖不住那张充满朝气的生气勃勃的，似乎还很幼稚的孩子面孔。

那时在我们的军队里是非常注重开生活会的。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成绩，改正缺点。在我们这半军事化学校里也一样。在每周的生活会上，我们同学之间，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相互指出缺点和错误，作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开始我很不习惯，听了批评很委屈，有时还觉得是在挑刺，时而又掉眼泪。但通过党的不断教育和自己的学习，知道了自己身上还存在很多缺点，并且还经常主动向同学和战友们征求意见呢。当时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给我的一生学习工作都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0年7月“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成立了。紧接着又为我们这批年龄小些的成立了一个中学部。我们这批“洋包子”和一部分陕北同学转到延安城南门外杜甫川中学部。在这里每个班都有教导员负责。当时学习和生活仍然很紧张，军训虽然没有了，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课方面任务很重。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在开学典礼上讲：我们要自力更生，建设边区，培养人才，准备未来。班上的同学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参差不齐，来自前方后方的随到随插班，工作或前线需要则随调即去。在这里我们完成了数、理、化、生物、英文等基础课的学习。教员大都是专家，水平很高。加上同学们都渴望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这个难得的机会，多学点知识，所以效果很好。第二任院长徐老（徐特立）曾是毛主席的老师，也给我们教过课。他的生活、学习、工作、品德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人们很难相信，在那艰苦的条件下，前方炮火连天，边区的供应异常艰难。学习自然科学真是既无书本、实验条件，又缺乏师资，还要拿近三分之一的时间种菜、纺线、烧炭，搞政治运动、群众活动等等，在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当时同学们战胜了各种困难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这主要都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远见卓识英明决策。他们从开荒垦粮、制造枪械战胜敌人的封锁，从边区建设到战争胜利后给国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做出这种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我们很多同志就是用前后两度（中间一段转到延安中学——延安大学中学部）在自然科学学院学习的基础知识，在日本投降后走向全中国，接受了日伪留下的企业，又兴办了诸多的工业、大专院校、科研等管理机构，成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不少同志也就是凭这些基础知识留苏学习时能很快跟上班，而且获得了优良成绩。

走上工作岗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穷凶极恶的德、意、日法西斯强盗陷入了灭顶之灾。以苏联红军为首的同盟军，一举攻

克了希特勒的巢穴柏林。希特勒自杀，墨索里尼见大势已去也上吊而亡，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唯独蹂躏中国人民最久的日本法西斯，还在做垂死挣扎。全国人民浴血奋战，苏联红军又转战我东北战场。日本法西斯被迫于8.15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消息像一声响雷振撼着祖国大地。八年抗战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大家彻夜不眠，热情欢呼。秧歌队、锣鼓声，整个延安都沸腾了。大家都纷纷向组织请战，到全国各地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做开辟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做准备。我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部工作，心情也和大家一样更是着急，恨不得立即打背包马上就出发，唯恐被留在陕北。好在如愿以偿，命令下来了。中央命令我们组成四大队（周扬为队长）从延安向东北进发，去夺取全国的胜利。临行前大家反复学习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精神，深深懂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今后的工作将更加艰巨。并时刻铭记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从当小学生做起，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些话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并且大多数同志都保持了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告别了把我们从一个普通的穷孩子培养成一个革命战士的革命圣地延安。经过两个月的行军生活，队伍到了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我因已是政府干部，就被晋察冀边区政府留下，分配我去组建汽车修理厂。基础就是日本投降后留下的一个大仓库。里面的物资不少，但有关汽车的的确不多。我和我的战友又是我的同班同学芦文俊（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一起，他当厂长我抓人事组织。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凡日伪留下的破旧汽车零配件，都由我们收管。从招收技工到修整车间，从收集破旧汽车零配件到修出第一批汽车交给司令部，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回想起来，还应归功于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好景不长，冀察热辽边区向冀察晋边区求援，借调一批年轻有文化、能做经济工作的干部去做禁烟工作，我被选中。当天打招呼办转党手续，第二天打背包就出发了。到

热河后，被分配到围场县禁烟督察局任缉查大队长。围场县是日伪种植鸦片产量最多的县，当地人吸毒很普遍，土匪活动猖獗，大烟走私严重。我这个不到 20 岁，一没正式打过仗，二没缉查知识，三没见过大烟的年轻人，凭着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人民的拥护，背着长短枪，带着一个排的缉查队伍以及从部队抽调的十几名缉查员和外加在各县区推荐的一些情报员就干了起来。好在我哥哥当时正在围场县政府做领导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工作进行的还比较顺利。我们首先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搞调查研究，宣传党的政策，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然后再依靠情报员的准确消息，我们搞突击打埋伏，风餐露宿，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收缴了四万两大烟土，狠狠地打击了土匪的猖獗走私活动，惩办了首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提高了我党的威信。

10 月张家口再次失守。我们奉命撤离。到林西后，碰上欧阳钦（我父亲任西北局秘书长时，他是西北局组织部长）命我带一个机枪排乘两辆卡车保护李云如夫妇到东北局报到。一到哈尔滨，我立即看望了李富春、陈云、高岗、王首道等老首长。他们看我的一身破军装已破烂不堪，就给我换了一身日本投降后留下的新的装束，还给我挑了一支新手枪，分配我到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在此期间先后接收了日伪在阿城所办的酒精厂（那时我们没有石油，军车靠酒精当燃料）、日本在佳木斯办的试验农场和看管 60 余家的日本俘虏（企业和科技人员及家属），并参加了土改后期的工作。1947 年调回哈尔滨。后来又派我到原日本的康德毛织厂任厂长（现在的东北亚麻厂），加上两名警卫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这个小厂长同工人同吃同住，他们从往日的受剥削受压迫，到今天当家做主人，他们把全部心血都献给工厂。从什么都没有到生产出产品，还不到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工人师傅的先进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工人阶级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富有牺牲精神的高尚品质。并且我还跟工人师

傅们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纺织机械安装、生产、管理等本领。

东北第二纺织厂开始建设。上级又派我去做筹建工作并担任该厂的厂长。那时该厂定为具有 3500 人的规模，陈云等领导同志并指示要在一年内开工生产，厂址设在原佳木斯的旧飞机场，可实际上除了厂址外还一无所有。当时的一个日本专家预测最少得需要 3 年时间。……现实的困难，使我这个 20 来岁的小厂长真有点力不从心了。好在有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开诸葛亮会，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全体总动员（包括家属），发扬南泥湾精神，边维修安装机器边盖厂房，我们吃住在工地，日夜不停。用了不到 11 个月的时间，一个初具规模的纺织厂就建成了。开工典礼那天李富春同志亲自前来祝贺，庆祝我们自己的纺织厂诞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越发感到知识的不足，于是我向蔡妈妈写信要求，能否有一个到党校学习的机会。不到一个月，上级派来了一名经过长征的干部（张清水后来任过纺织部副部长）来接替我的工作，命我办完手续后马上返回哈尔滨。到哈尔滨后姐姐告诉我，党组织要派我们去苏联学习，我听后真是高兴得难以置信。想起父辈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苏联东方大学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学习各方面知识，现在形势刚一好转，党就给我们创造了这一难得的机会，高兴之余又有些担心，自己的知识水平很有限，况且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是否能跟上苏联的正规大学，唯恐怕辜负了党对我们的期望。1948 年秋，蛟河一战取得胜利，东北战线的形势迅速好转。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我们一行 21 人告别了首长、蔡妈妈和送行的战友、亲人，登上了前往满洲里的列车。

沐浴在社会主义苏联的阳光下

从满洲里过境，我们进入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将要开始我们新的学习生活。从赤塔的逗留到红场的参观，从瞻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到目睹有着古老历史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风貌，这一切都令我感到那么的新鲜和羡慕。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极大代价的苏联人民，战争的创伤尚未医治好，人民

的生活还很艰苦，各方面的建设恢复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苏共中央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对战后第一批经过战火中的锻炼并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来苏联接受高等科学技术等各方面专业学习的人才非常重视。为了尽可能给我们创造一些好的生活条件，把我们送到北方纺织中心——依万诺娃市的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俄文基础学习。当时国内战场还在战火纷飞，人民还在浴血奋斗，而我们却身穿西服在安静温暖的环境里学习（苏联当时的室外温度是零下40多度），所以心里都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党和人民。

学习任务非常艰巨，况且我们没有一点俄文基础，经过三个月紧张的俄文学习，我们掌握了一般的生活用语，就被分配到纺织工业学院开始了正式的学习。

1949年我们自己的驻苏使馆成立后，将我们转学到莫斯科，经蔡妈妈的指点和对苏联纺织业的考察认为，中国的纺织业不亚于苏联，对于专业学习的重点不应放在纺织，况且我国的地质行业还很薄弱，人才还很贫乏，所以我改学地质。这一决定成为我终身奋斗的目标。对于地质这门学科，我还很陌生，当时只知中国地大物博，找寻地下宝藏很重要，而对于学什么，地质工作者是个什么样，丝毫概念都没有。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坐落在红场的西头，左边是美国驻苏使馆，右边是莫斯科大学，离莫斯科大戏院、高尔基大街都很近，而宿舍都相距很远，同石油学院、矿业学院的学生宿舍学生城在一起。校舍很挤，但教师、实验设备、学习条件等都是苏联同专业中最好的。从进入金属——非金属/矿产普查——勘探专业学习开始，系主任及系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非常关心，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在学习上相互帮助，并派了专门的教师“高尔基纪念馆”一位文化等各方面修养很高的老太太对我们进行了单兵教练，在短短的一年学习中，学习了苏联文学史、高中的俄文、指定我们看了许多小说，背诵马雅科夫斯基的诗等等，老师耐心的谆谆教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象。还有一位古生物老师对我也是单独辅导。她对工作一丝不苟，讲课深入浅出，对生物的发展史及标准化石的讲解都带有很严肃的科学态度，抽签考试时，她让苏联科学院两位古生物学院士（她的学生和系主任）前来监考，当回答正确时她满意的微笑了。打分时讲道：我教过好几个国家的学生，但中国的学生还是一流水平的，成绩优秀。在她心目中的“人参”（她常这样呼叫我，因我的名字叫任湘）似乎还是个难得的人才，毛主席 1949 年访苏时，接见我们留学生时并亲自为我题了词“开发矿业”四个大字。他老人家的话奠定了我一生的奋斗目标，并为我国的地质矿产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为开发矿业而奋斗

地质工作是工业的尖兵，矿产普查——勘探工作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游击队。1952 年底，从苏联留学回国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任教。从助教、讲师，到 1961 年被评为副教授，从教研室副主任到系主任，担当着专业新课的讲授。如找矿勘探地质学，稀有元素矿床及勘探学等，从教材到实验课内容，全部自编，以及毕业生实习，论文编写的指导还要带研究生。在担任三系（稀有放射性矿产地质和物探系）系主任时，还兼任稀有矿产地质教研室主任和系总支书记。一肩几副担子确实使我忙得不可开交，但特殊的环境，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也迫使我初步摸清和掌握了大学的教学工作规律，并对专题学科进行了自修深造，从许多老专家那里学到了不少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本领，以及还从援华的苏联专家那里（大多是我留苏时的教师还有系主任）学到了不少从理论到实践等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不断得以提高和巩固，这对于掌握和巩固专业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3 年春的一天，地质部通过刘型院长通知我说聂荣臻同志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叫我去参加。到会的有地质、冶金、化工三个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此外还有著名的稀土金属冶金专家叶诸

沛和我。一见聂伯伯，我便向他问候，他也开门见山的对我说：中苏科学院合作研究白云鄂博，取得了初步成果，但稀有放射性元素的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价还没有做，这是全国124个重点项目之一，现在决定由你这位稀有元素矿产勘探专家去完成。以地质部为主，冶金、化工部密切配合，怎么样？”听口气已经决定了，这对于我这个共产党员除了坚决服从之余，唯恐怕完成不好任务外，没什么可讲的，最后会议决定：由我担此重任，5年内完成。5年时间不算太长，但当时爱人米宏在湖南就学，3个孩子尚小，继母就全面担当起抚养的责任。我稍加料理，就开始了任务的准备工作。回想1953年我曾陪同宋应副部长和苏联专家组长，到白云鄂博检查铁矿勘探工作，在以后的教学中，也将这一特殊矿床编入教材，但对于深入细致地了解还是这次下了任务以后。工作一开始，不到1个月就上了矿山，经过踏勘，在不到3个月内编写出勘探设计。包括工作方法、程序、难关的攻克计划、人财物的安排、组织管理等，报到部里去。很快就批了下来。我从全国的稀有元素分析鉴定，普查勘探技术骨干中，挑选了一批人，还吸收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原内蒙古二〇五队将全部基地让给我们，并吸收了该队的一批工人和管理干部，由内蒙地质局副局长兼任队长，我任总工程师兼副队长，至此地质部一〇五队就诞生了。经过3年艰苦奋战，攻克了稀土、铌、钼、钽项分析，27种稀土元素矿物、15种铌矿物及几种放射性矿物的分析鉴定，以及稀土铌在矿石中含量，在各单物中含量及其所占储量比例的评价，稀土、铌、选矿试验等技术难关。最多时开动了15台钻机，对全部铁矿体、结合开采现状，重新圈定编图，并计算了储量。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对我队的生产、科研、方法、三套报告审批通过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至此，我们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四清、文化大革命相继到来，走资派、臭老九、托派等莫须有的罪名，也就强加在我身上。在这种异常混乱的历史条件下，我背着满身的罪名，奉部令，带着大部分技术骨干又转战到甘肃、青